

碟碟不休

“你问我恨你有多深”

■韩连庆

【此前受交流方式和物理空间的限制,家长在教育孩子时,顶多拿邻居家的或者同事家的小孩做比较,但是如今在家长的微信群里却常年驻扎着十几个,甚至上百个“邻人”家的优秀小孩,从而像瘟疫一样引发了教育焦虑。】

在周星驰主演的《大话西游》中,至尊宝被春三十娘杀死之后问观音菩萨:“他真的不明白,恨一个人可以10年、50年甚至500年这样恨下去,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?”观音菩萨回答说:“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,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的仇恨。”至尊宝打了个响指,说了声“明白”,转头去戴金箍。

在阿根廷电影《荒蛮故事》的一开场,一架飞机上的乘客在闲谈时突然发现,他们都认识一个叫加百利的失败的音乐家。这些乘客中包括他的前女友、批评过他的乐评人和老师、跟他有过节儿的同学和同事。原来加百利使用各种手段,将此前的这些“仇家”哄骗到同一架飞机上,然后操纵飞机坠毁。影片随后的五个故事都围绕仇恨主题来展开,例如两个陌生人在公路上飙车引发冲突,最终导致车毁人亡;有个人因为违章停车,汽车被拖车公司拖走,多次冲突之后一怒之下炸毁了拖车公司。这部电影还有其他两个好玩的译名“生命中最疯狂的小事”和

“无定向丧心病狂”,形象地阐释了电影的主题。《荒蛮故事》很像贾樟柯执导的《天注定》。两部电影都是围绕同一主题,将几个不同的故事串联起来的。《天注定》是由真实事件催生的,秉承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,而《荒蛮故事》则显得更荒谬、更极端和更具黑色幽默色彩,将现实中的仇恨和暴力推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,因此也就更胜一筹。贾樟柯聪明的地方在于,他在《天注定》中用不同人物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或者以擦肩而过的方法,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,使四个不同人物的命运有了细若游丝的联系,回应在海明威在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扉页上引用过的约翰·多恩的那首著名的诗歌:“无人是孤岛/可以自全/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/整体的一部分……因此,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/它就为你而鸣。”

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他的代表作《交往行为理论》中,区分了人类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。工具行为以经验知识为基础,遵守的是技术规则。交往行为以语言符号为媒介,遵守的是规范。这些规范组成了社会的制度框架,而制度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通过消除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,并由此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。对哈贝马斯的这番理想言谈,德国哲学家斯劳特戴克(Peter Sloterdijk)讽刺说:“更多的交流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更多的矛盾。”他认为“相互理解”必须用不要挡彼此的道路、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实施新的“谨慎规则”来补充。看来消除仇恨并不是靠一部“经书”就能化解的。

精神分析学认为,邻人(neighbour)是一个创伤性的人侵者,具有极度的含混性。邻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,当过于接近邻人时,就会扰乱我们生活的平衡,引发不安和焦虑,从而造成仇恨和暴力。由此既可以解释《荒蛮故事》和《天注定》,也可以关照当前西方社会对移民的恐惧。

邻人是指离你“近”的人,这里的“近”与空间距离无关。有人曾经注意到,当今中国流行的“教育焦虑”与微信的兴起几乎同步。此前受交流方式和物理空间的限制,家长在教育孩子时,顶多拿邻居家的或者同事家的小孩做比较,但是如今在家长的微信群里却常年驻扎着十几个,甚至上百个“邻人”家的优秀小孩,从而像瘟疫一样引发了教育焦虑。这就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“知情太多的人”(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,这是希区柯克的电影《擒凶记》的直译片名),会处于危险中,起码会引发焦虑和嫉妒。

老子说: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。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据说这是《道德经》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喜欢的一章。一次有学生问我,什么是理想中的社会?我也引用了这段话。我说,以前要过上这种生活还得跑到荒郊野外,自己耕田种地,现在有个互联网,“宅”在家里就能实现这一理想了。学生说这有点太消极了吧,我说那就换成张充和先生的一句诗:“十分冷淡存知己,一曲微茫度此生。”

鹊桥仙
遐想

■吴硕贤

茫茫宇宙,
遥遥星际,
别有宜居乐土,
清风洁水若长存,
便清育,
生机无数。

有情似我,
智高可待,
发达文明尤著。
他年若是有缘逢,
须携手,
共营天宇。

千里涂鸦

2022 呼和浩特更通达

■郑千里

【伴随着中国铁路现代化事业,列车在钢轨上铿锵飞转,将内蒙古的交通经济带进了新时代。】

我感到相当惭愧,在不断行走的职业生涯里,除了台湾省之外,内蒙古竟是去过次数最少的一个省(区),比去新疆、海南甚至西藏的次数都少。

若论地域距离,内蒙古显然没有新疆、海南和西藏那么遥远。难道是北京到内蒙古的交通不够通达?

不说内蒙古飞机、汽车等交通出行,管中窥豹,我只说借助火车的出行。

徐晓杰是呼和浩特火车站党委副书记,他为我介绍“草原驿站”的交通史话:

1921年平绥铁路(北平——归绥)的建成通车,结束了在我国广阔草原上没有铁路的历史。平绥铁路线横穿归绥城的中心,建成呼和浩特火车站的前身归绥火车站。

但归绥火车站建站之初,仅有火车线路三股半,每天通过的客货列车不足10对。

随着这条草原铁路开通并继续向西拓建,与平汉、北宁、津浦、同蒲等铁路干线接轨,逐渐形成贯通当时的燕、晋、察、绥四省,辽阔草原与我国内地相连的交通格局。

伴随着中国铁路现代化事业,列车在钢轨上铿锵飞转,将内蒙古的交通经济带进了新时代。

1969年至2015年,通过不断“换血”和“输血”,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的站改,呼和浩特火车站旧貌换新颜。

呼和浩特火车站在最近一次扩建之后,候车大厅已可容纳6000人,日均接发列车46.5对,年旅客发送量比1921年建站之初的不足千人,已然增长了一万倍以上,2016年达到1000

多万人次;年货物发送量2800万吨以上。

目前呼和浩特有两个火车站,除了呼和浩特站,呼和浩特东站遥相呼应,也已于2012年12月正式通车运营。

呼和浩特东站的整体设计,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,将“草原穹庐、展翅雄鹰、白云故乡、青色之城”作为造型立意,综合考虑到功能性、系统性、前瞻性、文化性和经济性,把现代交通建筑与内蒙古地域文化特色融为一体。

两个火车站堪称比翼双飞,在包头和鄂尔多斯等城市之间,1小时城际交通圈已形成通达态势。

旅客在呼和浩特东站乘直达快车,到北京只需6小时。

铁路交通实现由“走”到“飞”的通达,极大促进了内蒙古,特别是呼和浩特工业、科教、文化、旅游、物流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,铁路交通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凸显。

“通达”还有通晓的洞达之意。作为呼和浩特铁路局的领导,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眼界和智慧,应该能通晓当今世界,洞达五洲风云。

“通达”有亨通显达的意味;“通达”有沟通和传达的内涵。一言以蔽之,道路通达则百业兴。一个多月前,习近平考察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,一再强调:“中国把承办2022年冬奥会视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事件,承诺一定把它办好。”

习近平多次谈到一个时间的巧合:2022年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。

北京冬奥会需要保障观众的“通达”:更加便利快捷的通行,更加安全省时的到达。

中国承办2022年冬奥会,世界的目光炯炯,自然投射到张家口及位于张家口东的崇礼赛场,一百年前就有的张家口火车站,正是京包铁

路和京呼铁路的必经之地。

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承办,必将给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,给呼和浩特铁路“撸起袖子”大干一场,提供相当不错的机遇。

内蒙古的首条高速铁路——呼和浩特至张家口客运专线,设计时速250公里,已进入了全面铺轨阶段,未来一两年建成通车后,将对促进对外开放,振兴产业经济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。

徐晓杰告诉我,在呼和浩特郊外,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“白塔”火车站,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5月10日其开通。

1977年由于京包线局部改线,白塔火车站终于废弃,现在已成为呼和浩特铁路局的科普教育基地。白塔火车站虽不再营运,但依旧风华独到,见证了呼和浩特近代铁路工业的发展,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,也是中国人自己建造铁路的重要见证。

2014年7月1日,运行了半个世纪的绿皮火车,终于全部退出我国铁路客运历史的舞台,无论是绿皮火车磨损的车轨,还是它那已不再铿锵的车轮,都一起延伸向时光隧道的远方,逐渐在我们的视野里黯然消失。

我们偶然也会怀念老铁路、怀念早年的绿皮车厢。那是王蒙笔下载着春之声序曲的希望之列车;那是陈道明和巩俐主演的《归来》;那是北村笔下《周渔的火车》,那也是《哦,香雪》,铁凝笔下那位纯情乡村少女香雪的身影……

漫漫的草原丝绸之路重振雄风,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草原文化,伴随着崛起的京呼银榆城市群,必定会长风浩荡地通达祖国四面八方。

我们将无比欣喜地看到,朝着2022的里程碑,呼和浩特这座百年历史的草原驿站,正承载着塞北新星城市的诸多光荣与梦想,如扬鞭骏马,奋蹄跃起……

闾苑有书

【有些人对此颇为不解,认为我既没有在那里吃喝(没有产生诸如“韭菜包子”之类的恶劣影响),也没有去刻意干扰他人(没有行乞没有散发小广告没有逼着别人加我微信公众号),不过就是打了个电话,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,怎么就影响到他人了?】

稍微注意一下新闻报道就会发现,不少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冲突,往往都与手机通话有关——简而言之,一方指责另一方,认为他大声打电话影响到了自己,继而引发进一步的冲突。类似事件不仅发生在国内,同样也发生在国外,印象较深的一则新闻是:一名华人在国外地铁里打电话,被身边的外国人指责说,“你还要继续发出这种噪音吗?”

指责者的方式、态度甚至指责本身是否合理姑且不论,但有一点还是应该明晰,那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确属公共空间,大声打电话本身的确有些问题。有些人对此颇为不解,认为我既没有在那里吃喝(没有产生诸如“韭菜包子”之类的恶劣影响),也没有去刻意干扰他人(没有行乞没有散发小广告没有逼着别人加我微信公众号),不过就是打个电话,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,怎么就影响到他人了?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因为公共交通工具同样属于公共场所,大声接听电话等同于强迫别人接受你的“噪音”,这与在自己的私家车里打电话完全不同。

就物理学而言,所谓“噪音”是指发声物体做不规则振动所发出的声音,音高音强混乱不堪,是以听来极不和谐。本来人类的语言不属于噪音范畴,但这里涉及一个信息的传递与接收问题。作为交流的手段,任何语言都是有效的信息,但对一般人来说,某种毫不了解的“外语”自然是完全无效的信息,而这种无效信息对于无意中的接收者(打电话者身边的人)显然就是噪音。考虑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,各地方言又繁多芜杂,所以有时显示出与外语相似的效果。不妨设想一下,当有如噪音一般的通话环绕在你的身边,回荡在你的左右,是否也会让你感到心烦意乱?

那么,为什么对于同一种语言(在此完全不考虑方言问题,即针对电话者说的是旁人完全可以听懂的语言),同样会引起他人的极度反感呢?这是一

格致书屋

宋江——踽踽独行的“于连”

■隋淑光

【如果说于连是通过自身优异的资质作为进身之阶,那么宋江无疑是名声和人脉为他推开这扇门奠定了最初的基础;于连以捕获上流社会两个女人的感情为进身捷径,宋江则为了铺平招安之路恳请李师师暗通款曲。】

在《水浒传》最后一回,施耐庵将书中逐步营造的悲怆推向了极致:宋江率梁山群雄终偿所愿被招安,为情势所迫先后统兵破辽、讨田虎、征王庆、平方腊,108将凋残殆尽,十去其八,百战荣归后受封为楚州安抚使,却席未暇暖就受权奸诬害饮下朝廷颁赐的毒酒,同时也和着毒汁一并吞服了毕生孜孜以求的进阶梦想。

荣耀如此短暂,过程却如此艰难,这像极了于连的悲剧: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所著长篇小说《红与黑》中的主人公,他出生于小城维立叶尔的一个木匠家庭,父亲自私狭隘,两个哥哥也属粗俗之辈。于连却聪明英俊、精明能干,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于上流社会。他崇拜拿破仑,渴望像拿破仑那样身佩长剑,做世界的主人,但是当他意识到拿破仑的时代已经终结时,为了尽快飞黄腾达,审时度势转而研读神学。凭着精通拉丁文,他被市长德·瑞那选作家庭教师,并与德·瑞那夫人产生了感情。后来为避免事情败露,他不得不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,此后他受人推荐担任韦尔侯爵府秘书,并得到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情。正当他以为将要成功跻身上流社会时,德·瑞那夫人写信告发了他。愤怒的于连疯狂地打伤了德·瑞那夫人,也因此被判死刑,无奈跌落到上流社会的门楣外。出身,决定了他永远推不开那扇门。细思量《水浒传》全书,如果说宋江毕生的努力也是为了推开这扇门,或许并不失公允,并且低微的出身注定了他的这条博弈之路同样走得艰难又孤独。

在小说中,宋江是顶着巨大光环出场的,然而这光环却并非源于他“刀笔精通,吏道纯熟;更兼爱习枪棒,学得武艺多般”的自身本领,实质上他的粗浅武艺可能在群雄眼里不值一晒,真正的原因是“地名大孝,为人仗义疏财,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”。“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;但有人来投奔他的,若高若低,无有不纳……终日追陪,并无厌倦;若要起身,尽力资助。端的是挥金似土!人问他求钱物,亦不推托;且好做方便,每每排难解纷,以强者为尊的全人性命。”时常散施棺材药饵,济人贫苦。急人之急,扶人之困,因此山东、河北闻名,都称他做及时雨,却把他比做天上下及时的雨一般,能救万物”。

总而言之,造就这一巨大名声的重要根基是“仗义”和“疏财”,或许后者更为关键,因为它是实施前者的基础。作者这样的设置也营造了一个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的江湖——在本应崇尚武力、以强者为尊的丛林世界,却指定一个广施钱财的忠厚长者形象领袖群伦,让人人望风“纳头便拜”。

如果说于连是通过自身优异的资质作为进身之阶,那么宋江无疑是以名声和人脉为他推开这扇门奠定了最初的基础;于连以捕获上流社会两个女人的感情为进身捷径,宋江则为了铺平招安之路恳请李师师暗通款曲。

在这条博弈之路上,宋江其实一直形单影只,

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,当我们只听到谈话的“一半”内容时,往往会使我们更难集中注意力,也更容易走神分心。

为此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:让被试者完成一些简单的智力游戏,同时故意让人在一旁进行无关对话。被试分为三组,旁边的对话情况分别为:两人当面谈,一人说话一人沉默;一人独自电话。结果,后两组只能获得“单信息”的被试,无一例外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更多干扰,而且心情格外烦躁,各项测试数据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。

心理学家认为,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,是因为单边对话的内容难以预测。一般来说,我们的大脑对相对完整的对话会有较好的感知判断能力,反而容易忽略这种外界干扰;而对那种单边对话来说,大脑获得的信息有所缺失,难以预测,因而注意力更容易被分散。而在公共交通工具这样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接听电话,无异于强迫别人聆听不完整的单边对话,自然会对无心听者的认知产生影响。

所以,在公开场合接听电话时,很可能会让身边的人变得异常敏感。而这种敏感,有时难免会转化为怒气——尽管愤怒者的愤怒未必合乎道德。

所以——仅仅作为一个个人建议: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打电话,真的没必要节省这点儿时间;而接到来电时,只要不是十万火急,告诉对方一会儿回去更好。总之比较好的手机通话应当离开人群,在一个无人的角落对话,而且声音不要过大。毕竟,除了正在开会、正在放映的影院,其他很多地方也属于公共空间。而且这样做,也有利于保护自己的隐私——当然,那些喜欢当众在电话里谈论“几个亿的项目”或者“刚与某某要人”等话题者,除外。

身畔熙熙攘攘的107位同行者可大体分为三类:本意殊途而不得不同住者,如林冲、武松、鲁智深、阮氏三雄、李俊、童威、童猛等;重新踏回旧路者,即众多以各种手段收降的官军将领,如呼延灼、关胜、秦明、徐宁、董平等;本无目标,无所附从者,如只以杀人饮酒为乐的李逵。只有宋江目标坚一,全始全终,付出为最,跌落也最重,故悲剧意味最为强烈。他出身于“吏”,按照书中设定,距离“官”这一阶层虽然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逾越,因为在科举时代,从唐宪宗时期之后就禁止“胥吏”应试,即使他胸不锦绣,这条进身之阶也行不通。若是走高超武艺和将略,原可如同他劝武松那样走军功一途:“如得朝廷招安,你便可擒搦鲁智深投降了,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。”但是武艺和将略均非所长,这条路也前程渺茫。因此如不别辟蹊径,注定了其毕生只能犬马奔走、屈沉下僚,唯一可行的是剑走偏锋,迂回而行,裹挟群雄先做乱后招安之路。这或许正是他通过广施钱财结识群雄,达到“匹夫居间里,一呼百应”目的之所在。

从书中来看,他怀有强烈的成功意识,但在目标和达成之间的巨大悬隔使他的所言所行充满了悖论。比如说,他一方面“驰名大孝,为人仗义疏财”,另一方面酒醉后要“他年若得报仇,血染浔阳江口!”事实上在题反诗事发之前,浔阳一地真的无仇可寻。再比如说,他一方面醉后狂书“他年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”这样名副其实的“反诗”——这无疑是其内心深处对成功极致的理解,另一方面又在执掌梁山权力后改“聚义厅”为“忠义堂”,吟咏“中心愿平虏,保民安国。日月常悬忠烈胆,风尘障却奸邪目。天王降诏早招安,心方足。”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并推崇“忠义”,大概只有作者知道了。这样的言行让人不由得将其和于连,那个内心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人联系在一起;有人说“于连形象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的矛盾性,是典型的圆形人物,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。他最敬慕的人是拿破仑,却害怕别人知道而绝口不提;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,却扮出一副虔诚的面孔,他视《圣经》为谎言,却将整部拉丁文《圣经》背诵如流……正如评论家所言,为了实现“伟大”的梦想,保护虚弱的自我,于连淹没了内心真正的声音,戴上了沉重的“人格面具”。

如果细究底里,二人又有所不同,于连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者的典型,曾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,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平民反抗意识与平等精神。他的奋斗虽以虚伪为武器,但在妥协中也不乏反抗和自尊。比如说在应聘做德·瑞那市长家家庭教师时,他应聘的条件是和主人同桌吃饭以表平等。即使在他打伤了德·瑞那夫人后,面前也有两条路存在:一是屈膝乞求,接受恩赦,第二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,挺身赴死。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,他说:“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,我在陪审官的席上,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,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分子”。

而在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宋江身上,这一反抗意识和自尊意识却近乎阙如,为了铺平博弈之路,即使对高太尉之流他也是“纳头便拜,口称‘死罪!’”并且在临终时为了维护身后可怜的“忠义”声名,诬陷李逵一并饮下毒酒,裹挟他连同自己的悲剧一并进入坟墓。

来自「身边的人」的怒气

■星河